

## 时代征兆（外一篇）

〔英国〕托马斯·卡莱尔

乔修峰译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无疑是19世纪英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小说家乔治·艾略特在1855年说：“没有必要问一百年后还有没有人读卡莱尔。即便在他去世时，把他的书全都烧掉殉葬，也不过是伐倒一棵橡树，而种子早已长成茂密的森林。在我们这代人里，但凡才智超群、思想活跃的，很少有不受卡莱尔影响的。如果没有卡莱尔，过去十到十五年里用英语写的书几乎没有一本会是现在的样子。”的确，从狄更斯、罗斯金、盖斯凯尔夫人到爱默生乃至康拉德，受他影响的作家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我们对他也不陌生。早在清末民初，辜鸿铭、梅光迪、鲁迅等人就曾介绍过他。他的一些重要作品，如《英雄与英雄崇拜》《拼凑的裁缝》和《法国大革命》，也陆续有了中文译本，但他早期的散文还未引起太多关注。

19世纪二三十年代，初登文坛的卡莱尔以德国文学翻译者和评论者的身份，为《爱丁堡评论》等重要刊物撰写了大量文章。这些文章不仅奠定了他后来所有作品的思想基础，也是他最为出色的散文，充分展现了他犀利的目光，澎湃的激情和极富感染力的语言。出身于苏格兰农民家庭的卡莱尔，十几岁便到爱丁堡大学读书，但对该校的启蒙运动传统颇感不适，反倒在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中看到了走出时代困境的曙光。从1822年到1832年的十年

里，他不仅翻译了歌德的《威廉·麦斯特》，还撰写了二十余篇介绍德国文学的文章，为德国文学在英国的传播作出了拓荒性的贡献。当然，这些文章的核心目标，还是为现代化进程中的英国寻找健康的发展道路。

作为最早开始工业化的国家，当时的英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和现代转型。知识偏至、信仰失落、价值失范、财富分化、环境危机以及层出不穷的社会矛盾令很多英国人感到无所适从。卡莱尔对这些问题格外敏感，但他并不擅长分析，更多是凭借直觉和想象，用狂放有力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不过，也正是这种敏锐而直接的反应，让我们看到了现代社会骤然而至所带来的冲击，看到了他对时世的深刻洞察。他对时代的乱象看得十分透彻，对混乱无序的状态深恶痛绝，却又始终找不到通往秩序的道路。确切地说，他对自己所设想的道路也没有太多的信心。尽管他的声音铿锵有力，并不断产生回响，但在那些汹涌而至的文字背后，总有一丝愤懑和无奈。

本辑选译的两篇文章，显示了他深刻的洞见，新奇的想象，饱满的情感和有力的语言。《时代征兆》发表在1829年的《爱丁堡评论》上，《英国状况问题》则是他在十年后写的小册子《宪章运动》的第一章。这两篇文章就像两篇讲演，带有很强的现场感，仿佛能透过纸背听到他的声音。文章不是靠细腻严密的逻辑说理，而是用电闪雷鸣般的语言，排山倒海般的气势，点燃读者的激情。诚如当时一位诗人所说，卡莱尔的文字让人“震颤，仿佛某种新的神圣谕令，如滚滚雷声响彻星空”。这正是卡莱尔想要的效果，他就是要为现代社会敲响警世之钟。

有当代学者认为，19世纪那些“最初的现代主义者”比我们

还懂我们，比我们更能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这么说不无道理。倒不一定是因为我们的感知能力退化了，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从根本上走出他们所看到的困境。《时代征兆》无疑是一篇极具前瞻性的文章，深刻地指出了“现代性”的弊病。文章的核心观点是工业化进程改变了人的整个生存方式，人的行为模式，乃至思维和情感模式，都变得机械化了。在他看来，现代就是“机器时代”。对机器和机械模式的崇拜已经成为一种信仰，挤压了精神和情感空间，“不仅外在的、物质的层面受机械控制，内在的、精神的层面也未能幸免。”理性作为工具，本应为人服务，却反过来奴役了人，走向了它的反面。卡莱尔认为这是人们在失去“目的”之后对“工具”的信仰。这种机器信仰，已经侵入到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如同一个“钟形玻璃罩”，将人的身躯和心灵囚禁了起来。玻璃罩密不透风，令人窒息。纵然能透过它看到远方，却触摸不着。这个比喻不禁让我们想到狄更斯后来在《艰难时世》中所说的“石屋”和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铁笼”。显然，卡莱尔比他们更早地看到了现代社会的牢笼，也更为乐观，毕竟玻璃罩子比石屋或铁笼更容易打破。

要想打破这个玻璃罩子，首先要觉察到它的存在。卡莱尔对此却不很乐观。他认为现代的知识发展正在走向片面的极端，正在逐步抹杀人们的洞察力，造成了时代的精神瘫痪。现代的机器信仰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知识的偏颇”，不仅将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捧为主流科学，还将机械的方法应用到了整个哲学、科学、艺术和文学研究之中，生出各种“渺小的理论”。这些理论也像钟形玻璃罩一样，将人的思维囚禁起来，让人无法逃脱，因为知识传播所用的语言也已经机械化了，现代语言已经“形成一层硬壳，

包围着我们，使我们的思维变得麻木，把我们形成的每种观念都彻底裹挟了起来”（《英雄与英雄崇拜》）。结果，现代人得到了眼镜，却失去了眼睛。卡莱尔强调人要有“看”的能力，也就是一种能够穿透机械牢笼的敏锐洞察力。

在卡莱尔的思想中，行动是仅次于洞察力的重要力量，也是摆脱混乱状况的必要力量。他憎恨混乱，渴望秩序。在他看来，“英国状况”就是一种危险的混乱状态。这是他创造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说法，用来指占人口多数的下层民众的状况，因为“一个国家中大多数人的状况，就是这个国家的状况”。这种状况在当时已经成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英国劳工的“满腔不满已经十分严重和强烈”，但英国的统治阶级却仍旧置之不理。卡莱尔义愤填膺，认为英国的有识之士“不能再默不作声，不能再袖手旁观”，要站出来为不能言的下层民众代言。

1837年，英国遭遇了工业革命以来第一次大的经济危机，全国经济陷入萧条，工业发展停顿不前，失业状况十分严重，而食品价格又居高不下，民众的生活进一步恶化，统治阶级却仍奉行“放任自由”原则，还推出了旨在保护土地贵族和中产阶级利益的谷物法和新济贫法，最终引发了劳工阶级的宪章运动。英国工人向议会提交了一份请愿书，也即《人民宪章》，提出了六点要求，但遭到了议会的拒绝。1839年，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数达到了一百多万，宪章主义者先后在伦敦和伯明翰召开大会，并发起了暴动。正是在这一年年底，卡莱尔出版了他的小册子《宪章运动》，提出了“英国状况问题”这个响亮的表述，呼吁“无所事事”的统治阶层担起责任，体察民众疾苦，认真调查工人阶级的状况，采取理智而非高压的手段，解决这个日益紧迫的问题，使社会回

归到和谐有序的状态。

卡莱尔对英国状况的理解无疑是深刻的，切中了当时英国经济与政治制度的要害。早在1831年的《时代特征》（*Characteristics*）一文中，他就提出了国富民穷的问题：“国家富裕了……国人却变穷了。”1842年，他在写《过去和现在》时，再度谈到英国状况，并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英国的巨大财富，到底是谁的？”他认为英国的工业化取得了累累硕果，却没有使英国人富裕起来，因而是一种“被施了魔咒的财富”，不属于任何人：“我们的财富比古来任何民族都多，但我们从中得到的好处又比古来任何民族都少。我们所谓的辉煌的工业实际上是不成功的；如果我们听之任之，那它就是一种怪诞的成功。”在他看来，唯有公平地分配这些财富，才能实现真正的成功。卡莱尔并没有一味地反对工业化，甚至肯定了工业发展带来的巨大能量，但他也没有忽略工业化的负面效应。他的主要目的是唤醒统治阶级的良知，让他们关心民众疾苦，通过渐进的改革而非革命来改善民生，解决英国状况问题。他的语言是激进的，思想却是保守的。与其说这是一种局限，不如说是激情与审慎的平衡。也正是像他这样的一批“情感激进派”，唤醒了英国社会的道德敏感性，为英国的现代化进程创造了一种兼具批评与建设的文化氛围。

由于卡莱尔常有洞幽烛远之明，又好作惊世骇俗之论，有人便把他视为先知或圣哲。当然，也有人把他看作狂人或疯子。但说到底，他就是一个竭力理解现代社会的艺术家。与他同时代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虽然不很欣赏他的文风和观点，却也承认，他是一位诗人，而且是一位有敏锐直觉的诗人。今天再读卡莱尔，依然能够感受到这位诗人的力量。

《时代征兆》（*Signs of the Times*, 1829）与《英国状况问题》（*Condition-of-England Question*, 1839）均选自《托马斯·卡莱尔著作集》（*The Works of Thomas Carlyle*），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译者

## 时代征兆

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过多沉溺于预言未来，都不是好兆头。快乐的人心系当下，因为当下的富庶令他心满意足；明智的人也心系当下，因为当下的责任令他无暇旁顾。毫无疑问，我们的头等大事并非遥望朦胧的远方，而是做好眼前。

你已了解昨日，它的意图和由来，  
也努力不让今日光阴虚度？  
那就静待明日的时景慢慢展开，  
无须害怕它会招来怎样的变故。

可人的“理性能力十分强大”，必将“瞻前顾后”。无法忍受“无知的当下”，则必将沉溺于幻想未来，结果得不偿失。郁郁寡欢的人，不会相信当前只有这么多邪恶；雄心勃勃的人，也不会满足于当前的成就，一心要在未来云做的画布上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不过，这种情形对国家来说更为不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不再是一个人在预言，而是很多人在预言，你呼我应，相煽成风，导致预言的大潮汹涌漫溢，最后连扫罗<sup>①</sup>都被卷了进来。也因为心灵的相互作用还是有魔力的，少数人无心说出的胡话，借助神秘的回响，也能让许多人狂热不已。人们不仅失去了思维能力，也失去了感知能力。就连坚决不信的人，也和其他人一样，被熔化在炉火之中，成了牺牲品和燃料。情投意合，原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却很少成为真理和美德的亚伦神杖<sup>②</sup>，反倒经常充当邪恶和愚昧的巫师魔杖，着实让人痛心！没有哪怕一个异端，也几乎没有哪怕一个疯子，敢像现在这么多神智正常的人那样，胡思乱想，胆大妄为，还以为得到了真知灼见。看看不久前的法国大革命吧！面对这样的浩劫，轻佻浮薄无济于事，严肃认真也无能为力。在新英格兰，清教徒捕烧巫师，向看不见的魔鬼世界开战，与每日乃至每时都会冒出的末日幽灵殊死搏斗，许久之后才猛然发现自己已经疯了，于是放声痛哭，忏悔已过，那段黑暗的日子仿佛做了一场噩梦。

老英格兰也有这种狂热和恐慌。幸运的是，它们近来和其他古老的顽疾一样，有所缓和。自泰特斯·欧茨<sup>③</sup>时代以来，基本没再闹出人命。眼下，除了受害者失去了理智，并没有太多其他损失。不过，这种疾病虽然威力小了，次数却多了，让人觉得就像自然灾害一样，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不期而至。于是，理智的人，就像生活在浓雾中的伦敦人，出了门就小心翼翼地加入到摸索着

---

① 以色列第一位国王，在位后期听信谗言，导致国力减衰。

② 亚伦为基督教《圣经》中的人物，相传为犹太教的第一位大祭司，其杖能制造奇迹。

③ 泰·欧茨（1649—1705），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叛徒，捏造所谓天主教徒阴谋暗杀国王查理二世的假案，使约35名无辜的天主教徒被处决。

前行的人群之中，大中午也耐心地打着灯笼，坚信太阳还在天上，总有重见天日的时候。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常有人说，国家这艘巨轮已经失事，正飞速下沉。可直到今天，它还完好无损，浮在水上。所谓的“国家危急”，我们已经见了不下百次；至于教会，从我们知道它起，就很少不是处在“危急”之中。

所有人都知道，现在正面临这样的“危急”，也知道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先是废除《宣誓条例》<sup>①</sup>，接着又解放天主教徒<sup>②</sup>，很多拥护这些法案的人便惊诧了。难道这些规矩不是像世界根基一样，千年不变，万年不移吗？怎么转眼就灰飞烟灭，一去不返了？这些忠心耿耿的朋友，把正在睡觉的海怪<sup>③</sup>当成了岛屿（常有人教导他们说，“不容异端”就是一个怪兽，也只能是个怪兽），找了个背风的地方，在它鳞皮上轻松地抛下锚，便寻思着庆祝一番。他们也的确快活了一阵子。可现在，海怪突然下潜了，他们没法再像原来那样，任凭风吹浪打也能纹丝不动。现在只能和他人一样，被时间的大潮卷起，随波逐流。其实，只要他们能弄明白，这原本也没什么好怕的。只可惜，他们一时半会儿还理解不了。他们的小岛竟然消失了，掉进了汹涌的漩涡，这世界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纵然地上的大陆仍旧岿然不动，纵然天上的北极星和所有指路明星永远灿烂，可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们心爱的小天堂消失了，这可让他们怎么平静得了！于是，各种定期刊出或终年出版的文字，开始日复一日地发布最悲惨的预

---

① 该条例于1673年颁布，规定凡公职人员就职时必须宣誓效忠国王、信奉国教；1828年废除。

② 指英国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初给英国和爱尔兰的罗马天主教徒以自由。

③ 即利维坦，基督教《圣经》中象征邪恶的海怪。



言。君主已经名存实亡，教会不仅成了寡妇，还没分到任何遗产<sup>①</sup>，公共原则已经消失殆尽，个人诚信也日渐消亡。一言以蔽之，社会正飞速地土崩瓦解，一个彻头彻尾的邪恶时代正向我们袭来。

不难想见，在这样的时期，预言的激情更容易点燃。于是，右有千禧年主义者<sup>②</sup>循循善诱，左有穆勒门徒<sup>③</sup>谆谆教导。第五王国派信徒<sup>④</sup>手捧《圣经》，功利主义者怀抱边沁<sup>⑤</sup>学说。一派宣布，最后一印<sup>⑥</sup>将于一八六〇年开启；另一派则保证，“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将在更短时间内把人间变成天堂。这些乱象我们见多了，就觉得有必要或有把握进行干预。殊不知，时间自会让各方得到解脱。鼓励预言或其他噪音的，正是“回声”。不理睬这些聒噪，它们反倒消失得更快，并最终遁于无形。

同时，我们也得承认，当下是重要时期。所有当下都必然是重要时期。最糟糕的日子总是当下。它位于无穷的过去与现在的交汇之处，潮流从最遥远的过去汹涌而来，又朝最遥远的未来奔腾而去。如果我们够聪明，就能觉察到真正的时代征兆，了解时代的缺陷和优势，从而合理调整自己的位置。与其徒劳地凝望模

---

① 指寡妇授予产，即结婚时丈夫指定其死后给予妻子的财产。

② 他们相信将来会有一个黄金时代，即在世界末日前，基督将亲自为王治理世界一千年。

③ 指后文所说的功利主义者。詹姆斯·穆勒（1773—1836）为苏格兰功利主义伦理学家，其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著有《功利主义》。

④ 第五王国指以基督为王的千年王国，只有在此时才能伸张正义。

⑤ 杰里米·边沁（1748—1832），英国哲学家和法学家，功利主义伦理学的代表，认为利益是行为的唯一标准和目的，每个人关心自己的利益，就会达到“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⑥ 指基督教《圣经·新约·启示录》中描述的七个封印。

糊的远方，不如静下心来，环顾四周，看看我们脚下这个凌乱的舞台。也许，细看之后，有些乱象会消失不见，有些独有的特征和深层的趋势则清晰显现出来。我们也就更容易看清自己与时代的关系，看清我们在这个时代的真正目标和任务。

倘若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当今时代，我们不会说这是一个英雄的、虔诚的、哲学的、道德的时代，而首先是一个机械的时代。无论从字面还是比喻意义上说，这都是一个机械的时代。它全力以赴地推动、传授、践行着一种使手段适应目的的伟大艺术。现在，没有什么能够直接做成或手工完成，一切都得遵循特定规则，借助精密的机械。哪怕最简单的操作，都有工具器械随时待命，都有省时省力的窍门可供使用。古老的劳作方式受到了质疑，被丢到一旁。各行各业活生生的手艺人都会被赶出作坊，速度更快却毫无生命的机械取而代之。梭子从织工手中滑落，掉进了能让它更快速运动的铁手之中。水手也收起船帆，丢掉船桨，指挥着力大如牛且不知疲倦的仆人，插上蒸汽的翅膀，在水上飞驰。汽船已经穿越了大洋，伯明翰的火轮也抵达了神秘的东方。倘若世上还有卡蒙斯<sup>①</sup>来歌功颂德，我们就知道，好望角的神灵又受到了惊扰，只是现在的动静远比达·伽马<sup>②</sup>那时候骇人。机械没有止境。连马匹都卸了挽具，喷着火的铁马开始东奔西跑。这还不算，大师们已经开始用蒸汽孵蛋，母鸡要失业了！世间的一切活动，乃至某些精神层面，都可以使用机器和机械手段。可以剁白菜，也可以治失眠。我们可以

---

① 路易斯·卡蒙斯（1524—1580），葡萄牙诗人。

② 达·伽马（1460?—1524），葡萄牙航海家，首辟由欧洲绕非洲好望角到印度的航道。

将大山夷为平地，让大海变成坦途。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我们向原始的大自然开战，只要搬出无坚不摧的机器，必将无往不胜，满载而归。

人类的物质力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现在，只消动手指，就可以吃得更丰盛，穿得更华丽，住得更舒服，物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无比滋润。想到这些，谁不感激涕零？这种力量的增强，会给社会体系带来怎样的变化？财富又如何越积越多，并且渐聚集到少数人手中，不可思议地改变旧有关系，拉大了贫富差距？这将是政治经济学家面对的问题，也是他们迄今为止遇到的最复杂且最重要的问题。

不过，我们还是暂且放下这些问题，看看我们时代的机械精神如何渗透进了那些迥然不同的领域。如今，不仅外在的、物质的层面受机械控制，内在的、精神的层面也未能幸免。没有什么事情还能顺其自然，也没有什么事情还能用古老的自然方法完成。无论做什么，都有精巧的工具和预先准备的器械，都不再用手工，而是用机械完成。我们有教育机器，如兰卡斯特<sup>①</sup>机器，哈密顿<sup>②</sup>机器，导生、地图和象征符号。教育原是智慧与蒙昧的神秘交流，是一个需要了解学生资质、因材施教的探索过程，并无一定之规，如今却成了一项可以信手拈来、千篇一律、轻而易举的工作，只要用上适当的机械，配上手头的知识，就能批量完成。我们还绞尽脑汁，想出了各式各样的宗教机器。圣经公会自称是更高级的

---

① 约瑟夫·兰卡斯特（1778—1838），英国教育家，开创了导生制，即由教师选择年龄较大或较优秀的学生进行教学，然后再由这些“导生”将所学内容教给一组学生。

② 威廉·哈密顿（1805—1865），爱尔兰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发展了几何光学理论，提出了“哈密顿函数”。

天国机构，可稍作考察就会发现，它完全是个俗世组织，靠的是收钱敛财、煽扬虚荣、信口雌黄和阴谋诈骗，是一台令异教徒改信基督教的机器。其他领域莫不如此。任何人，任何团体，如果想宣讲一个真理，或完成一项精神任务，绝不会只用身体器官立马去做，而是先召开一个公开会议，任命委员会，发布计划书，一起聚个餐。一句话，就是要通过设立机构来宣讲，使用机械来完成。没有机械，他们就灰心丧气，束手无策，活像一群蹲坐在兰开夏郡<sup>①</sup>腹地的印度织工。还应留意各种机器是怎样从某些重大社会思潮中获取动力的。我们身边的每个小派别，像一位论派<sup>②</sup>、功利主义者、再洗礼派<sup>③</sup>和颅相学家，都有各自的周报、月刊或季刊，就像他们的磨坊风车一样，招摇于市，谋求民众的支持，为社会碾磨粮食。

个人也不例外。那些与生俱来的能力，都失去了用武之地。现在没人愿意舍弃机器，单枪匹马去完成哪怕最微不足道的任务。他必须求助于现有的组织，借他们的牛来犁自家的地。当今时代最明显地诠释了一句话——“生存意味着要么加入一个团体，要么创建一个团体。”哲学、科学、艺术和文学，无不依赖机械。即便牛顿在世，也不可能通过苦思冥想，从掉落的苹果中发现世界的规律。现在有的是和牛顿迥然相异的人，站在博物馆或科学机构中，面对整套的蒸馏甬、煮解器和电池<sup>④</sup>，专横地“拷问自然”，却不急于给出答案。我们固然没有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和莫扎特，可

---

① 兰开夏郡是英国当时最大的纺织工业区。

② 该派认为上帝只有一位并否认基督神性。

③ 该派认为婴儿受洗无效，成年时应再受洗礼。

④ 1800年，意大利科学家伏打（1745—1827）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电池——“伏打电堆”。

我们有皇家绘画学院、雕塑学院和音乐学院，足以提振日渐消沉的艺术精神，正如官办的厨房必然有更多珍馐佳肴。文学也有连锁机制，包括生意宴请，编辑的秘密会议，以及出自私心的吹捧。因此，书不仅是由机器印刷的，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机器来写作和销售的。

民族文化，精神建设，也都交给机器操办。如今不会再有女王克里斯蒂娜<sup>①</sup>派人去召笛卡尔；也不会再有腓特烈大帝<sup>②</sup>遣人去请伏尔泰，用大把的年金和成堆的好话供养他。现在，任何有品位的君主，若想开启民智，只需新增一个税目，用收来的钱办个学院就可以了。于是，各种皇家学会和帝国学院，各种图书馆、雕塑馆和科技馆，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大都市涌现出来，宛如大批精工构筑的蜂巢。以为这样，四方智士就会踊跃前来，入住酿蜜。同样，如果我们意识到宗教正在衰落，也不必紧张，只要投票表决，拨款五十万，采购砖石灰浆，建造新教堂就可以了。爱尔兰人似乎还嫌不够，居然成立了一个“每周一便士赎罪协会”！可见，机械的精灵就侍立在我们身旁，帮我们解决一切困难和危机，用其铁肩扛起我们所有的重担。

虽然我们只是蜻蜓点水地说了说，但并不意味着这些现象不重要，它们标志着我们的整个生存方式发生了剧变。这种习惯不仅控制了我们的行为模式，也控制了我们的思维和情感模式。不仅手变机械了，心和脑也变机械了。人们不再相信任何人力或自然力量。人们殷切盼望并孜孜以求的，不是内在的完美，而是外在的联合、组织、机构和体制，也即各种各样的机

---

① 克里斯蒂娜·奥古斯塔（1626—1689），瑞典女王，学识渊博，酷爱艺术。

② 腓特烈大帝（1712—1786），普鲁士国王，在位期间扩张军事，赞助文艺。

器。人们所有的行为、喜好和观点，都转向了机器，并带有了机器的性质。

这种情形在我们时代的各个重要领域都有。知识方面有，包括最受宠的那些学问及其研究方法；实务方面也有，包括政治、艺术、宗教和道德；精神方面的所有源头和全部潮流都有，丝毫不亚于物质方面。

不妨以欧洲科学的总体现状为例。形而上学和精神科学正全面走向衰落，自然科学的威望和受重视程度与日俱增，这已是公认的事实。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已经没有了关乎精神的科学，只有关乎物质的科学总体上或在具体学科上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法国人最先抛弃了形而上学，尽管他们最近想重振往日雄风，却还没有任何复苏的迹象。这片孕育了马勒伯朗士<sup>①</sup>、帕斯卡、笛卡尔和费奈隆<sup>②</sup>的土地，现在只剩了库辛<sup>③</sup>和维尔曼<sup>④</sup>，自然科学方面倒是能够提供更长的名单。我们国家呢，关于心灵的哲学，在经历了蹒跚学步的童年之后，远还没到活力四射的成年，就突然开始衰老，憔悴，并随着最后一位和蔼可亲的园丁——斯图尔特教授<sup>⑤</sup>的故去而夭折。除了德国，没有一个国家大力发展过心理学，自然也谈不上硕果累累。一句话，这个时代的主流科学是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科学在各个方面都透着机械气质。我们看重的数学，是上述各学科的光荣代表，也变得越来越机械。能否在所谓

---

① 马勒伯朗士（1638—1715），法国哲学家，继承并发展了笛卡尔的学说。

② 弗朗索瓦·费奈隆（1651—1715），法国天主教大主教、作家、教育家。

③ 维克多·库辛（1792—1867），法国哲学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著有《论真、善、美》。

④ 阿贝尔-弗朗索瓦·维尔曼（1790—1870），法国政治家、作家。

⑤ 杜格尔德·斯图尔特（1753—1828），苏格兰哲学家，著有《人类哲学原理》。

的高等数学领域取得成就，很少取决于天赋高低，更多取决于能否熟练使用数学机器。我们不是要贬低拉格朗日或拉普拉斯<sup>①</sup>等人借助数学机器取得的优异成果，而是说，他们的微积分，无论是微分还是积分，都不过是一个构造精巧的算术磨坊。可以说，只要把因子放进去，就能加工出产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不用做，只需要匀速地摇动把手。数学的应用比以前多了，数学的科学却少了。阿基米德和柏拉图固然没有读过《天体力学》<sup>②</sup>，但整个法兰西学会也无一例外会把“上帝运用几何原理”这句话当作痴心妄想。

不仅如此，自洛克以降，我们所有形而上的学问，都成了形而下的；哲学不再涉及精神，只关乎物质。洛克的《人类理解论》显然只研究了人性中可估量的那些特质，居然一直被尊为科学大作，真是奇怪至极，终有一天会被视为当今时代精神的一个奇怪标志。洛克的整套理论，无论是目标和源起，还是方法和结论，都是机械的。它并不是关于心灵的哲学，它不过是讨论了意识或观念（或其他叫法）的起源，追溯了我们在心灵之中所见事物的发生史。它丝毫没有涉及必然性与自由意志，没有涉及意识对物质的必然或不必然的依赖，也没有涉及我们与时空、上帝和宇宙的神秘关联，似乎跟这些问题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苏格兰形而上学的最后一脉，隐约意识到这种做法问题

---

① 约瑟夫·拉格朗日（1736—1813），法国数学家、力学家，变分法奠基人之一；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1749—1827），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  
② 拉普拉斯在1799年至1825年出版了5卷巨著《天体力学》，第一次提出了“天体力学”这一名词。

很大，却不知道该怎么纠正。里德<sup>①</sup>学派最初走的也是机械道路，看不到还有别的出路。这个学派是在反驳休谟的过程中形成的。由于休谟从他们公认的前提出发，得出了怪诞的结论，他们便是放出直觉，让它充当一条六亲不认的看门狗，去阻拦那些结论。休谟用一条逻辑锁链，把他们和整个世界无情地拖向无神论和宿命论的深渊。他们便使劲往回拽。可不知怎地，这条锁链被拉断了。结果，现在没有人在乎休谟，也没有人在乎他们了，就像不再在乎同一时期英格兰的哈特莱<sup>②</sup>、达尔文或普利斯特利<sup>③</sup>。人们可能会觉得哈特莱的“振动”说<sup>④</sup>太偏重物质，太过机械，可我们大陆的邻居们却还嫌不够。他们的一个哲学家近来发现，“正如肝脏分泌胆汁，大脑也分泌思想”。更近些时候，卡巴尼斯<sup>⑤</sup>医生又在《有关人的身体和灵魂的报告》中，把这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发现推到了极致。

卡巴尼斯的玄妙学说自然不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他拿着解剖刀和金属探针，优雅地打开了我们的精神构造，又拿出列文虎克<sup>⑥</sup>的显微镜和解剖用的充气吹管，将这构造呈现在人们眼前。虽然他也承认思想的确是分泌的，但诗歌和宗教信仰却是

- 
- ① 托马斯·里德（1710—1796），苏格兰常识学派创始人。
  - ② 大卫·哈特莱（1705—1757），英国哲学家，联想主义心理学创始人之一，著有《对人的观察》。
  - ③ 约瑟夫·普利斯特利（1733—1804），英国神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反对三位一体等基督教教义。
  - ④ 哈特莱认为，当外在刺激引起神经冲动时，神经就会振动，此振动又沿神经脉络向大脑传导，引起脑神经振动，从而产生观念。
  - ⑤ 皮埃尔·让·乔治斯·卡巴尼斯（1757—1808），法国医生、哲学家，生理心理学先驱。
  - ⑥ 安东尼·列文虎克（1632—1723），荷兰显微镜学者，微生物学的开拓者。



“肠子生产的”。真是大开眼界！让我们向这位学富五车的医生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他穿越奇境，却毫不惊奇，这得需要多么强大的科学定力啊！这就好比一位智者，穿过沃克斯豪尔<sup>①</sup>那样地方，火树银花，焰火璀璨，乐声悠扬，凡夫俗子陶醉不已，他却觉得都是镜花水月，无非是些硝石、纸板和制作琴弦的肠线罢了。医生的大作代表着当今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最高水准，出色地实现了马丁努斯·斯克里博莱诺思<sup>②</sup>那个荒唐的念头——“正如烤肉炙叉旋转器能够烤肉，身体也能思考”。纽伦堡人便深受鼓舞，打算用木头和皮草制造会思考的人，“其思维能力绝不亚于大多数乡村牧师”。沃康松<sup>③</sup>倒是造了一只能吃会拉的木鸭，可纽伦堡人的大胆设想，恐怕只能等现代的专家们来实现了。

这就是两大知识领域的现状：物质研究全靠机械理论，精神研究则不再开展，因为人们发现，用机械理论来研究精神，不会有任何结果。这充分体现了我们时代的学术偏见，机械的研究正侵入各个领域。其实，人们早就在心底里传播着一种观点，有时还会说出口来：只有研究外在世界的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外在世界是通往内心世界的唯一道路（假如还有内心世界的话）；一言以蔽之，凡是不能用机械的方式研究或理解的，就根本不可能被研究或理解。我们之所以把知识领域的这些倾向视为突出的时代征兆，就是因为思想与行动的关系是双重的：思想影响行动，又会被行动影响。因此，各个时代的思想倾向，基本上都最为有力地向我们展示了该时代的实践倾向。

---

① 指伦敦的沃克斯豪尔花园或类似的娱乐胜地。

② 18世纪英国诗人蒲柏在《群愚史诗》中虚构的人物。

③ 雅克·沃康松（1709—1782），法国发明家。

例如，当今时代的政治最明显地体现了我们的机器信仰。我们不仅对它笃信不疑，还几乎把它当成了唯一的信仰。政府包含很多机械的层面，也需要机械地处置。我们也在日常语言中把它称作社会机器，仿佛它是一个转动的巨轮，个人的一切行动都源自这里或适应这里。作为比喻本无不妥，可没想到，“泡沫居然成了炮弹”，我们轻率地召来了这个面目狰狞的幽灵，却怎么也赶不走了。事实上，政府还包含很多并不机械的层面，不能机械地处置，但当今的政治思想和实践却越来越不注意这一点。

不仅如此，我们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人们对单纯的政治安排抱有极大的兴趣，这本身就是机械时代的征兆。欧洲所有的不满都指向了政治安排。所有的文明国家都发出了一声深沉有力的呐喊“改革政府！”现在所有人都意识到，这声呐喊必须要回应，也必将得到回应。只要能合理组建立法机构，有效监督行政机关，正确安排司法体系，人类就幸福了。这个时代的哲学家不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胡克、泰勒<sup>①</sup>等人，因为他们反复教导人们，道德上的善必不可少且价值无限，幸福取决于我们内在的心灵，而非外在的境况。这个时代的哲学家是斯密、狄龙<sup>②</sup>、边沁之流，他们讲的恰恰相反，不仅幸福完全取决于外在境况，心灵的力量和尊严，竟然也是外在境况的产物和结果。只要法律、政府井然有序，我们就没有问题，其他的一切都会照顾好自己！现在已经很难听

---

① 理查德·胡克（1553?—1600），英国基督教神学家，创立安立甘宗神学，著有《论教会体制的法则》；杰里米·泰勒（1613—1667），英国基督教圣公会教士，著有《圣洁生活的规则和习尚》。

② 让·路易·狄龙（1740—1806），英国政治理论家，著有《英国政体》。

到公开或隐含的不同意见了。尽管人们在应用这个原则时，会有很大的分歧，有时甚至瞋目切齿，但都承认这个原则本身没有问题。

为了实现或确保这种包办一切的完美安排，双方提出的方法都同样机械，同样简单。我们不再关心道德、宗教和精神状况，只关心可用法律调节的物质、生活和经济状况。于是，物质王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崇拜和关注，精神王国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视和冷落。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政治改革，都与爱国没有多少关系。当然，我们说的是高级或高尚意义上的爱国，而不是出自动物本能或纯粹出于习惯的爱国。人完全由个人利益来引导，能平衡这些利益的政府就是好政府，因此，只需要对个人利益的敏锐判断和渴求，用不着任何德行。政府明显被当成了机器，不满政府的人认为它是个“税收机器”，满意的人则认为它是“保护财产的机器”。政府扮演的角色不是父亲，而是教区治安官，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看它是否尽到了责任。

因此，人作为社会存在，要想得到拯救并不断升华，就只需要确保这台机器能够正常运转。坏了就修，滴上润滑油，让它恢复运转。只要打造好法律体系，用不着劳神费力，那万众仰慕并翘首以盼的自由女神，就会不请自来。在她的羽翼庇护下，一切有害的力量都会萎缩，一切良善有益的力量都会不断壮大。这还不算，由于我们对这个信念太执着，也太机械，竟然孕育出了一种新行当——“法典编纂”，或毋宁说空幻的法规制定。任何民众，只要理由合理，都能得到一部专属法规，比挑剔的人定做一条裤子还简单，因为民众不需要事先丈量尺寸。

我们生活在这些现象之中，不断看到每个人的信念、希望和

实践都依赖这样那样的机械，也就觉得这一切很正常，觉得事情似乎本来就该这样。但稍作回顾或反思就不难发现，现在和未来都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因为以前人们认为，机械的领域——即政治机构或宗教机构等外在机构——只涉及一小部分人类利益，而且绝不是最重要的部分。我们有理由相信，任何时代都应该这样。

用学术点的话说，人类命运和天性既有机械的层面，也有动态的层面。除了研究机械层面的科学，还有研究动态层面的科学。后者探究并切实应对人类原始的、天生的力量和能量，包括引发爱惧、惊奇、热情、诗歌和信仰的那些神秘源泉，它们都有真正的生命力，都是无限的。前者则主要探究上述力量和能量在后天有限的发展，即直接的“动机”，如期待回报或担心惩罚。

这就清楚了。过去的智者及其开明的追随者，通常是道德家、诗人或教士，在没有忽略机械层面的情况下，主要研究动态层面，致力于调节、增强、净化人类内在的原始力量。他们认为这才是最棘手的问题，也是最该贡献力量的地方。但到我们时代，情况已大为不同。现在的智者是政治哲学家，只关心机械层面，致力于计算和估量人的动机，希望通过精细地核查、比较和调整盈亏得失，找到获取最大利益的道路。只可惜，这些“动机”多如牛毛，在每个人身上又千差万别，导致他们得不出真正有用的结论。尽管从社会和道德的角度看，精心设计的机械也为人类作了不少贡献，但我们仍然无法相信它是人类价值或幸福的主要源泉。不妨想想，在构成人类快乐的主要成分中，在将人的生命提升到现今高度的成就和财富中，有哪些是得益于各种机构或机械的，又

有哪些是得益于本能的无限力量的（这种力量是大自然馈赠的，今后还将赐给人类）？例如，我们能不能说科学和艺术主要受惠于各种学校的创办者？科学的起源和进步难道不是源自罗杰·培根、开普勒<sup>①</sup>、牛顿等人的书斋，源自浮士德和瓦特等人的作坊，源自开天辟地以来大自然派到人间各处并以各种面目现身的精灵？又如，荷马和莎士比亚可曾加入任何可以领俸的组织，或靠这种组织才成了诗人？绘画和雕塑是经过事先谋划，由专门的机构创作出来的吗？不是。科学和艺术自始至终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是一种不请自来、不期而至的礼物，还经常是很有分量的礼物。可以说，这些礼物都浑然天成，扎根在大自然的自由土壤之中，在阳光的滋润下破土而出。它们不是种出来的，也不是嫁接出来的，更不会因为各种机构培育施肥就格外茁壮。机构的帮助通常是有限的，摧残倒是不少。这些礼物会建构自己的体系。它们源自人性中的动态层面，而非机械层面。

不妨再举一个至高无上的例子——基督教。不管信不信它，也不管如何阐释它，都应把它看作我们整个现代文化的最大荣耀，甚至是生命和灵魂。基督教是怎样兴起并传播的呢？借助了组织机构和严密有序的机械体系？恰恰相反。在古往今来所有为此而建的机构中，基督教的神性都毫无例外地出现了衰落。基督教源自人的灵魂深处，通过“宣讲圣言”，通过简单的、纯粹自然的个人努力传至四方，就像薪薪相传的圣火，净化并启迪众生。它的圣洁光芒如日月星辰，永远照耀人类的黑暗命运。这跟机械没有关系，人类的最高成就是由动态而非机械的层面

---

① 罗杰·培根（1214？—1294），英国哲学家和科学家、方济各会修士，从事光学和天文学研究；约翰内斯·开普勒（1571—1630），德国天文学家和占星家。

实现的。

不仅如此，甚至可以说，人类所有的伟大成就，乃至一切影响深远的运动，也都源自人性的动态层面。尽管看似不可思议，但只要细思历史，就不难发现，核查和比较盈亏得失，从来没有成为人类的左膀右臂。盈亏得失之虑，急功近利之求，从未让人焚膏继晷，全力以赴；只有那不可见的无限目标，才能令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欧洲十字军起于宗教，他们的可见目标从商业的角度说一文不值，他们真正向往的是不可见的世界，那里的熊熊火光令可见世界如纸卷般皱缩。这场浩大的运动，不是机械的，也用不着机械手段。不需要共济会酒馆的聚餐和其他一系列现代机构，也不需要妥善协调各种“既得利益”，只需要一人慷慨陈辞，炽热的灵魂透过双眸迸射出来，枕戈待旦的欧洲勇士就会热血沸腾，随他南征北战。后来的时代也不例外。宗教改革有一个不可见的、神秘的、理想的目标，其结果固然体现在外，但其精神和价值却是内在的、不可见的、无限的。我们英国的革命也是起于宗教。那时候，人们的确在为良心而非金钱而战。其实，这一点至今未变。法国大革命并不只是为了便宜面包和人身保护令<sup>①</sup>，它还有更高的目标，也涉及一种理念，一种动态而非机械的力量。尽管是一场盲目并最终走向疯狂的斗争，却仍是为了捍卫权利、自由、国家的无限性和神圣性。

人就是这样，不管在什么时代，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捍卫与生俱来的神圣权利。大自然也是这样坚守其神奇而坚定的道路；我们所有的系统和理论，都不过是浪花和沙滩，大自然会不时地

---

<sup>①</sup> 指传讯诉讼当事人出庭的令状，当事人得以请求法庭裁决其受拘禁是否符合法律程序。

把浪头抛上岸，抹平沙滩。当我们能把大海倒吸进水车磨坊的水池，把万有引力装到瓶中零售时，我们或许有望用盈亏得失公式来理解人类灵魂的无限空间，并通过核对、调节和权衡，像操作一台专利机器那样操控这一切。

单讲政府吧。还有必要指出，一切精神生活都须臾不可离的自由，不能只靠增减“民主利益”，还得依靠许多更加复杂的因素吗？那些“走先验大路”的人，能说出都有哪些因素吗？它们曾经起过或可能会起怎样深刻、微妙而又复杂的影响？不是机械发明并制造了人，而是人发明并制造了机械。不是伟大的政府造就了伟大的民众，而是伟大的民众造就了伟大的政府。机构固然重要，却并非万能。自由高尚之士，常生于逆境之中。圣保罗和众使徒在政治上还属于奴隶，爱比克泰德<sup>①</sup>更是奴隶出身。不考虑骑士制度和宗教的影响，是什么样的国家出了哥伦布和拉斯·卡萨斯<sup>②</sup>？或者，撇开美德和英雄主义不谈，单论活力和智力，又是什么样的国家出了科尔特斯、皮萨罗、阿尔瓦和希梅内斯<sup>③</sup>？十六世纪的西班牙有残酷的宗教裁判所和腓力二世<sup>④</sup>，可当时的西班牙人无疑是欧洲最卓越的民族。如今，西班牙还是那个政府，西班牙人却沦落为最消沉的民族。荷兰人也还是过去的政体，却没有了

---

① 爱比克泰德（55?—135?），古罗马哲学家，奴隶出身的自由民。

② 拉斯·卡萨斯（1474—1566），西班牙神学家，在西印度群岛向印第安人传教。

③ 埃尔南·科尔特斯（1485—1547），西班牙殖民者，1518年率探险队前往美洲大陆开辟新殖民地；弗朗西斯科·皮萨罗（1475—1541），西班牙冒险家，率远征队征服秘鲁；阿尔瓦，即费尔南多·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1507—1582），西班牙将军，1580年征服葡萄牙；希梅内斯，即吉麦内兹·德西斯内罗斯（1436—1517），西班牙天主教枢机主教。

④ 腓力二世（1527—1598），西班牙国王，英国女王玛丽一世的丈夫，反对宗教改革，迫害“异端”。

莱顿之围<sup>①</sup>和沉默者威廉<sup>②</sup>，甚至没有了埃格蒙特和维特<sup>③</sup>。我们英国虽然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却也未如如愿地得到好报。两百年前，下院议长若向女王伊丽莎白奏事，还得屈膝跪地，并因为这位悍妇没有将自己一脚踢开而心中窃喜。可那时候，治理国家的不是某个卡斯尔雷<sup>④</sup>，而是某位伯利<sup>⑤</sup>；那时候有莎士比亚和锡德尼，而我们呢，只有谢里丹·诺尔斯和博布鲁梅尔<sup>⑥</sup>。

这些我们都已经耳熟能详，它们所揭示的真理也显而易见，并且一直被既往的时代奉为圭臬，本不应在此赘言，可现在又不能不说，因为人们已经完全忘记了它们，或最多把它们当作一个不切实际的模糊传统。一方面，我们的体制建造者，政治家，经济学家，公共机构的指导者、创建者和改革者，也就是形形色色的机械论者，上至法典制定者，下至造车工匠，都在高谈阔论。而另一方面，本应弘扬诗歌、宗教、道德的牧师和教师，却几乎全都噤若寒蝉。我们不禁觉得，人性的动态层面要么已经失去了所有的精神追求，要么就是已臻完美之境，无须再用古老的办法

- 
- ① 1573—1574年，在荷兰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莱顿城遭西班牙军队围困，军民誓死抵抗。
  - ② 沉默者威廉（1533—1584），奥伦治亲王，领导荷兰反抗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统治。
  - ③ 拉莫尔·埃格蒙特伯爵（1522—1568），荷兰名将，反对西班牙的政策；扬·德·维特（1625—1672），荷兰联省共和国首席执政官，重振荷兰国力。
  - ④ 卡斯尔雷子爵，即罗伯特·斯图尔特（1769—1822），英国外交大臣，制定遏制拿破仑和俄国的英国对外政策。
  - ⑤ 即威廉·塞西尔（1520—1598），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枢密顾问，曾任国务大臣、财政大臣。
  - ⑥ 谢·诺尔斯（1784—1862），爱尔兰剧作家、演员；博布鲁梅尔，英国纨绔子弟乔治·布莱恩·布鲁梅尔（1778—1840）的浑名，其深色朴素的服饰成为英国摄政时期男子流行服装的代表。



增添一毫，今后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机械手段上。

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盘根错节，密不可分，本质上无法划分疆界。至于孰轻孰重，在不同的时代，即便最睿智的人士也会根据时代的需求和形势，做出不同的判断。目前来看，只有妥善调和二者，大力推动二者共同发展，才是正道。过度培养内在或动态的层面，会误入徒劳、空幻、不切实际的歧路，在蒙昧时代还会引发迷信和狂热，带来一系列臭名昭彰的恶果。同样，过度培养外在的层面，虽然不会立即看到坏处，短时期内甚至会有不少好处，但从长远来看，却一定会破坏道德力量，即一切力量的源头，带来更加不可救药的恶果。这就是我们时代的首要特征：凭借机械方面的进步，我们对外在事物的操控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在纯粹的道德本性上，在灵魂与品性的高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能比不上大多数文明时代。

事实上，只要稍作探究就会发现，这种机械信仰已经把根扎到了人类信仰最深也是最初的源头上，并在人的整个生命与活动中开枝散叶，结出了果实，但也长了毒瘤。人们不再相信不可见的世界，只相信可见世界，在可见世界中寄托希望，付出劳动。换言之，这不是一个有虔诚信仰的时代。我们不重视神圣与精神，只看重物质与实用。美德本是无限且绝对的，现在却逐渐成了有限且有条件的，由崇拜美与善变成了核算利益。的确，在我们身上，已经看不到任何意义上的崇拜了，或者说，崇拜已经被机械地解释为趋乐避苦。我们真正的神是机械。既然它已经为我们征服了外在的自然，我们相信，它还会包办剩下的一切。我们是拥有强大物质力量的巨人提坦，正奋力把一座座高山叠加在一起，

去征服天堂。这可不只是比喻。

我们不仅可以在当代的精神追求及其方法上清楚地看到这种强大的机械特征，还可以在我们精神天性的现状和主导倾向中看到。譬如当代总体的智力倾向。智力本指人的理解和判断力，现在却几乎成了逻辑的同义词，或仅指组织和沟通能力。它的方法不是沉思，而是论证。“因果关系”几乎成了我们观看自然、与自然相处的唯一视角。对任何物体，我们不是先问“它是什么”，而是问“它是怎么来的”。我们已经不再出于本能地去理解并铭记善与美的事物，而是像毫不相干的旁观者一样，探究它是怎么形成的，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们爱戴的那些哲学家，没有爱，没有恨，就站在人群之中，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创造，却像一个逻辑磨坊，把别人的劳动和创作放进去，碾磨个前因后果。在斯密、休谟和贡斯当<sup>①</sup>等人看来，只要磨坊运转正常，一切就都没有问题。罗耀拉的耶稣会，诺克斯的长老会，威克里夫或亨利八世<sup>②</sup>，诸如此类，都是机械现象，自然都得有其原因和影响。

擅写尤佛伊斯体<sup>③</sup>的当代作家，也与他们快乐的前辈大不相同。如今的聪慧之士大都在吹嘘自己拥有过人的智慧，自诩“沐浴在真理的阳光之中”。但仔细一看，他们只是沐浴在“逻

---

① 邦雅曼·贡斯当（1767—1830），法国小说家、政治家。

② 圣依纳爵·罗耀拉（1491—1556），西班牙教士，原为军人，创立天主教耶稣会；约翰·诺克斯（1514？—1572），苏格兰宗教改革家和史学家，创立苏格兰长老会；约翰·威克里夫（1330？—1384），英国神学家，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亨利八世（1491—1547），英格兰国王，通过“至尊法案”确立国王为英国国教会首脑。

③ 16—17世纪英国流行的一种多对偶、头韵、明喻的夸饰文体。

辑陋室”的烛光之中，浑然不知世上还有别的光，也不知用那光去观察别的事物。的确，惊奇感正全面走向消亡，惊奇感居然成了缺乏教养的标志。跟小人物谈伟大的宗教改革，谈伟大的路德，他立马就会开始“计算”：“时代环境”如何需要这样一个人物，又如何发现这个人就在路边等着，整装待发，准备去完成他的使命。“时代环境”又如何悄然依照最终目标来创造他，改造他，推动他。简短些说吧，纵然把这个小人物放到那个位置，他同样能够建功立业！这是因为，一切都是“环境的力量”造成的，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这种观点源自一个比喻。我们把社会比作“机器”，认为心灵和身体一样，个体差异不会太过悬殊。因此，两个或最多十个小人物的心灵加起来，必然大过一个伟人。荒谬！我们都知道，心灵跟心灵明显不能这么比。一个人，如果拥有更高的智慧，知道一个迄今不为人知的精神方面的真理，就比十个或一万个不知道的人都要强大，比所有不知道这个真理的人都要强大。他鹤立鸡群，带着超凡的天国力量，仿佛手拿一把上天铸造的宝剑，世间的铜墙铁壁在它面前也不堪一击。

可现在我们却很少有这种想法。不管享受什么，观看什么，我们都不再用肉眼，而是借助思考，像解剖那样条分缕析。就像休迪布拉斯爵士<sup>①</sup>一样，对每个为什么，我们都要有个答案。一切关乎人与神的事情，我们都有渺小的理论。诗歌本是才思的舞蹈，虽然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意义，但一直都被视为神秘莫测的灵感，如今也难逃科学的阐释。写高雅的韵诗，跟盖屋砌砖没什么两样，

---

① 17世纪英国诗人塞缪尔·巴特勒（1613—1680）的一首讽刺清教徒的诗中的人物。

关于它的上升、登顶、下落和倒塌（最后这一步似乎正向所有人逼来），我们都有理论。所有人心中都有对智慧和美的爱，那是一种深厚、无限、无法言说的爱，而所谓的“趣味理论”，却用“联想”之类的概念，机械地去揭示或“阐释”它，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休谟写了一部《宗教的自然历史》，这一部自然历史竟然包罗了万象。同样奇怪的是，在这个玄妙的问题上，大众的情感居然与休谟一致。无论教士还是俗众，似乎都认为，不管休谟写的“自然历史”是否正确，宗教都得有一部自然历史。只是，他视之为疾病，我们却视之为健康。虽然观点相左，但基本原理并无二致。

神学上的怀疑，即理性上质疑教会对《圣经》的解释，如今已经到了什么地步？我们也许无从考察，如果能，则意义重大。不过，所有人都能感到，这种深深的怀疑就在身边弥漫，甚至占领了布道坛，但没有人出来反驳，即便有，也微弱至极。在大多数国家，宗教都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也不再是它应有的样子。其实，所有国家都存在这个问题，只是程度不一。宗教不再是心中向上帝千吟百唱赞美诗，不再是真、善、美的源泉，也无法再从真、善、美的表象中看到，却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种纯粹基于计算的圆滑世故，和现今的其他事务一样，权衡利害，计算功用，自然也会为了丁点尘世之乐，牺牲许多天国之乐。因此，宗教也成了一种只图回报的收益，由崇敬变成了庸俗的期盼或恐惧。我们知道有很多人，也希望有很多人，还怀有一颗与此不同的虔诚之心，否则就太令人绝望了。要想证明这就是当今时代的特征，只需任意要找一位冷静而善于观察的人，不管他是否同意我们的感受，只管问问他，我们的这种观点是不是大致有根

有据。

稍加思考就会发现，文学也是这种状况。文学是印成文字的思想交流，在当下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常听人说，教会已经危在旦夕。诚哉斯言，只是教会自己并不知情。虽然它还能稳稳地收到什一税，功能却日渐被取代。当前，真正的英国教会掌握在报刊编辑手中。他们每天或每周向大众布道，向君主进言，提议求和或开战（那种号令天下的威风，只有最早一批宗教改革家和很久以前的教皇曾经有过），提出道德谴责，给予道德鼓励、安慰和教化，不遗余力地全面“执掌教规教律”。这些新兴的牧师，私底里与古代的托钵僧有几分相似，表面上热心神圣事业，内心却不乏阴谋诡计，追逐俗世红尘。不过，我们还是不谈他们了，也不必理会那些只会抱着枯枝败叶聒噪的鸣虫，而是去看看文学的高级层面。如果世间还能听到诗与智慧的纯美乐章，也只有去那儿了。我们并不缺才气，甚至还有那么一两位才华横溢的人，让我们感到了一丝优越。可他们唱的是什么呢？是门农石像<sup>①</sup>在旭日初升时演奏的天籁之音吗？是让我们感受到心灵与自然水乳交融的玉振金声吗？不是！不是晨祷和晚祷时献给美神的颂歌，而是饶钹刺耳的撞击，是人群鼎沸的叫喊，就像被丢到火中向摩洛神<sup>②</sup>献祭的孩童发出的惨叫！诗歌已经失去了洞察不可见世界的的能力。它崇拜的神不再是美，而是力，而且是力的某种粗野形象，不妨称之为幻象，因为真正的力与美并无二致，对它的崇拜也是一首圣歌。阳光温和不语，却塑造、创造、净化着整个自然；狂

---

① 埃及底比斯附近阿孟霍特普三世的巨大石像，在日出时发出竖琴声。

② 基督教《圣经·旧约》中在古代腓尼基等地崇奉的神灵，信徒以焚化儿童向其献祭。

风咆哮怒号，却是分裂、衰弱的征兆和产物，肆虐之后，也就被人忘却了。任何读过评论或诗歌的人，都能感受到当代文学多么崇拜物质力量。我们称赞一部作品，不是说它“真实”，而是说它“有力”；对作品的最高评价是它“打动了”我们，“震撼”了我们。很明显，这一切都是“野蛮人走到了极端”的表现，它体现的不是充满生机的净化，而是穷奢极欲的腐化。这一切也有力地证明，人们对真理的热爱坚不可摧，这种乱象不可能长久存在。纵然有拜伦的才华，也不可能诱惑我们永远崇拜幻象。更何况，就连有着塞壬般蛊惑力的拜伦本人，也已经不再受宠，早已被人遗忘。

再来看看我们的道德状况。细心的人会注意到，这里也充斥着同样的物质和机械力量。对于经常耳闻的“更高道德”，我们要表示感谢。但同时，只有盲人才会否认这种“更高道德”更应该叫作“更低犯罪率”。这是因为，导致这种改善的原因，不是人们更爱美德了，而是治安得到了加强，那个更加神秘强大的警力——舆论——也得到了加强。舆论就像百眼巨人，以前所未有的警惕监视着我们，可人们的“内在之眼”却昏昏欲睡。道德领域也很少见到对不可见的神圣事物的信仰。引领我们的，是有形的、物质的动机，而不是内在的、精神的动机。克己乃一切美德之源，却从没有像现在这么稀有。结果，大多数人即便在抽象思考的时候，也认为它是一个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幻象。美德就是快乐，就是好处，乃凡间俗物，与天国无关。有德之士、慈善家和殉道者都是幸运的意外，因为他们的“趣味”恰逢其时！不管从哪种意义上说，我们都在崇拜并追随力量，可以说是一种物质追求。爱真理，就该毫无保留，可现代人只肯把真理当作情

人，爱得十分有限。不仅如此，应该说，现代人并不相信真理，也不懂得真理，只是在“思考”真理，认为“各种可能都是存在的”！他高喊着这句话，勇敢地向前冲去，仿佛身后有一群人在为他摇旗呐喊。他还不忘回头看看，一旦欢呼声减弱，他也就停下不跑了。

事实上，我们所谓的道德已经变成了野心和“荣誉”。除了钱和钱能买到的东西，我们的理性能够想到的天赐之福只有出名。为良心而死，那是愚人的把戏。智者，要么为捍卫“名声”决斗而死，要么因深陷绝境自杀而亡。我们强调“环境的力量”，也就否认了我们自身的一切力量；我们拴在一起，穿着统一，动作整齐，就像一艘一眼望不到头的巨船上的桨手。这样可能是正确的，那样可能是合理的，但我们就是不能动手去做。多么让人惊叹的“舆论力量”！我们的动作和步调必须完全符合它的要求，做它吩咐的行当，赚它期待的数目，达到它要求的“影响力”，否则就会被轻视，巧舌如簧的舆论小风就会朝我们吹上几口，试问有几个凡胎俗骨有胆挺身一试？于是，我们的公民自由日渐得到保障，道德自由却几乎消失殆尽。实际上，我们的信条就是宿命论：手脚自由了，心和灵魂却上了枷锁，而且远比封建枷锁要紧。诚如哲人所言，“机械论的条条框框沉重地压在我们身上”。它们在书斋、市场、教堂和社会的中心，干扰着我们心灵的一切活动；我们最高贵的那些能力正逐渐陷入一场梦魇般的昏睡。

我们知道，我们时代的这些黑暗特征，其他时代也或多或少地都有。各个时代的弱者，盲目的不满者，以及所有向外而非向内求善的人（总会有不少这样的人），都会求助于机器信仰，求助于外在事物至上的信仰。我们还知道，虽然这些黑暗特征在我们

时代格外严重，却也只占了一半的画面。在完整的画卷上，除了阴郁的阴影，还有明亮的光线。如果我们这里主要在谈阴暗面，务请包涵，毕竟反思缺陷通常比吹嘘成就更有裨益。

尽管所有这些邪恶都大致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也从未对社会的未来感到绝望。莫说绝望，哪怕只是沮丧，都毫无根据。我们相信人的尊严坚不可摧，肩负着要在世间完成的崇高使命。不管国家境况如何，也不管悲观的理论家如何妄言，都改变不了这个似乎已经确凿的事实：在各个时代，哪怕从赫拉克勒斯的后裔和佩拉斯吉人<sup>①</sup>算起，人类总体上都在朝着更加幸福和伟大的状态迈进。当今时代无疑也在发展之中。它的动荡、忙碌和不满，本身就孕育着希望。知识和教育已经开始启迪最卑微的民众，有思想的人不断增多。世事原应如此，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在于往回走，不在于抗拒，而在于坚定地奋力前行。

而且，我们陷入现在的精神困境，只是因为舆论出了问题。既然是被自己打造的锁链缚住了，自然也能把它们扯断。我们屈从于外在事物，不能自拔，失去了自主能力。这不能怪大自然，只能怪我们看待自然的方式太愚蠢。我们不知道，人类现在仍然需要心、灵魂和身体原有的那些能力。“人一降生，就像亚当一样”，那未染尘埃的眼睛，看到的不是科学重塑过的硬梆梆的世界，而是一个可塑、柔软、无限、神圣的世界，和亚当看到的一样。机械主义像一个钟形玻璃罩，把我们罩进去，囚禁起来。我们的灵魂明明看到美丽的天国就在前方，可就是触摸不到，开始悲伤憔悴，眼看就要窒息在稀薄的空气之中——可这个罩子不过

---

① 史前居住在希腊、小亚细亚和爱琴海诸岛的一个民族。



是玻璃做的呀，“勇敢地来上一锤，打碎它，就得救了！”不可见的世界并未消失，它就栖居在人的心灵之中，而心灵犹在。上帝曾经显灵的神殿已经破败不堪了吗？可以修复，可以重建呀。先人的智慧和英雄气概，我们丢了，可还能找回来呀。虽然现在的贵族经常是一副玩世不恭、游手好闲的样子，但人们仍然仰慕往日的贵族，终有一天会争相效仿那时的高贵风范，人类也将恢复往昔的模样，而且会超越以往。这绝不是白日做梦，而是有可能，也是我们在当下的希望。在我国和其他国家，的确出现了一些鼓舞人心的迹象。这些迹象表明，机械不可能永远当我们的工头，对我们颐指气使，终有一天也会成为我们的仆人，对我们百依百顺，一个崭新而又光明的时代正徐徐走向人间。当然，这不是本文要谈的话题。

与此同时，也没有人会怀疑，外在世界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时代病了，脱臼了。很多事情都演进到了极致。古话说得好，“最黑暗的时刻也最接近黎明。”如果我们要寻找大众思想的征兆，不管到哪儿去找，是到法国和德国的出版物中去找，还是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希腊的烧炭党<sup>①</sup>起义等政治风暴中去找，听到的都是同一种声音。各国的有识之士都在要求变革。在整个社会构造下面，蕴藏着一场根深蒂固的斗争，新旧两种力量在永无休止地剧烈碰撞。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法国大革命并不是这场斗争的源头，而是它的产物。这两种敌对力量一直贯穿在人类事务之中，通过不断相互沟通来确保健康安全。它们渗进了不同的群体之中，经过了一代代人的积累，在法国出现了最为激烈的爆发，

---

① 19世纪意大利的革命组织，旨在统一意大利，建立共和国。

但没有显现最终的结局，实际上也还没有在任何地方显现。目前的奋斗目标是政治自由，但不会止步于此，也不能止步于此。人们在隐约追求一种比不受他人压迫更高的自由。追求这种更高的、神圣的自由，才是“人的正当用处”。所有伟大的机构、虔诚的奋斗和至高的成就，都只是这种更高自由的躯壳，是日渐接近这种更高自由的标志。

总的看来，地球这个奇妙的星球正与同伴穿越无限的空间，寄居其上的那些奇妙的命运也在随之穿越无限的时间，接受着更高的指引。目前，我们的天文学研究表明，地球正在往武仙座运动，那是一个物质力量十分强大的星座<sup>①</sup>。但这不是我们现在要关心的问题，因为不管它去哪儿，都逃不出浩瀚深邃的苍天。我们应该对此抱有希望，抱有坚定的信念。改造世界，改造国家，智者不会参与。只要不是愚人，就都知道，那虽然缓慢但却是唯一脚踏实地的改革，就是每个人都从自我做起，完善自我。

## 英国状况问题

有一种感受非常普遍：目前工人阶级的状况和情绪已经非常危险，应该站出来说点什么，做点什么了。当然，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有这种普遍的感受，并不奇怪。“国民请愿书”就摆在街头巷尾的车里，再“用铁圈箍起来，四个人抬着”，送到改革后的议会下院。已经有一百五十万人加入了“宪章运动”，眼见那铁圈

---

<sup>①</sup> 武仙座的名字取自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

箍着的请愿书没起作用，便捡起砖头，拿起长矛，甚至开始放火。对我们个人而言，多年以来，这就是最最凶险的现实问题。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它也会自己行动，而且是以任何人都不愿看到的方式行动。是该做点什么的了。我们迫切需要商议应该如何行动，迫切需要发出声音，展开调查！

我们知道，按报上的说法，宪章运动已经结束，改革后的内阁用最得体有效的方式“按下了宪章运动的魅影”。报纸是这么说的，可读报的人大都明白，按下的只是宪章运动的“魅影”，而不是宪章运动本身。最近几个月，宪章运动表现得有些狂乱，也格外引人注目。这些乱象是被压下去了。但与其说是被压下去了，还不如说是在自然规律或重力作用下跌倒，摔碎了。可是，宪章运动的精神并没有被压下去。宪章运动意味着痛苦的不满情绪，也即英国工人阶级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或愤怒的情绪，已经变得更加严重乃至疯狂。宪章运动只不过是一种新的叫法，以前有过很多叫法，今后还会有很多叫法。宪章运动不是件小事，它根深蒂固，影响深远，不是昨天开始的，也绝不会在今天或明天消失。改革内阁，设立乡警，新征士兵，给伯明翰拨款，不管是否可行，都只能压制宪章运动的表象或“魅影”。只要宪章运动的精神还在，就会不断涌现出新的表象，以及更加疯狂或不那么疯狂的魅影。所谓的宪章运动，过去有，现在还有，这个不幸的事实并没有改变。不管是“被镇压”后拿起生锈的手枪、硫酸瓶和火柴盒，转入地下，还是挥舞矛头和火把公开示威（哪种情形更为致命，我们不得而知），它都可能继续下去，直到有全新的方法来尝试解决它。工人阶级这种痛苦的不满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是怎样形成的，又会产生什么样结果？尤其是，要付出什么代

价，答应什么条件，它才能同意离开并平息下去？这就是急需解答的问题。

说它疯狂、邪恶、具有煽动性，这不是答案。就算穷尽了词语来描述它，也等于什么都没说。“格拉斯哥谋杀”，“格拉斯哥暴徒”，都是避重就轻的说法。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城市，一个曾以恪守基督教义著称的城市，居然有个“六十号”，走进昏暗的房间，跟刺客商量杀人的价格，的确让人毛骨悚然。可害怕有什么用？谴责，不，就算是定罪并流放到植物学湾<sup>①</sup>，又有什么用呢？格拉斯哥谋杀，宪章派火把集会，伯明翰暴乱，斯温纵火<sup>②</sup>，不过是些表面的症状。只顾消除这些症状，却不去治病，没有任何意义。致命的病灶还在体内扩散，腐蚀着生命的源头，毫无疑问，它还会不断长出新的疖子和浓疮，以此表明它仍然存在，它不愿只待在一个地方。这时，表面的疖子能否治愈，已经不重要了。

如果狂怒的宪章运动已经让这个群体中的有识之士都在思考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实在是无法视而不见），那么它必然不会无果而终。世上没有这样的事。英国劳工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是不是已经严重到连理智的工人也不能、不会甚至不应该安之若素？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是世间最复杂的问题，流放植物学湾、设立乡村警察之类的手段根本解决不了。还是说，工人的不满本身就如其表象一样，也是疯狂的？也就是说，不是劳工们的状况出了问题，而是他们的性情、思想、信仰和情感出了问题？果真如此，那也是严重的问题，和前一种情况一样危险，一样复

---

① 澳大利亚东南部的一个小海湾，因库克船长1770年在此登陆时发现了许多新植物而得名，1787年被选作流放地。

② 指1830年英国农民捣毁农业机器、焚烧地主庄园和粮仓的暴动。

杂。如果是后一种情况，似乎更常动用警力和单纯的高压手段来解决，但高压手段没法包办一切，单靠高压甚至起不到什么作用。如果工人的不满总体上确实是疯狂的，那也不能只靠警力来弹压，而是要设法让他们恢复理智，回归到令他们相对满意的状态。当一个民族大多数人的思想都陷入了疯狂，这个民族就会走向疯狂、混乱和灭亡！必须让大众恢复理智，否则高压手段也会失效。

我们已经听到有人在问，为什么议会没有调查清楚工人阶级现在面临的这个问题，以及他们的状况和情绪？真的，在如今这个改革年代，这个问题竟然没能在国务辩论中占有一席之地，这让远远观望议会的人怎能不感到惊诧。难道，在立法者眼中，还有比这更紧迫的事情吗？人们可能会觉得，改革后的议会应该早点着手调查民众的不满情绪，而不是等到他们挥舞长矛和火把上街示威！人们吵吵闹闹、辛辛苦苦地把议员大人们送到圣司提反礼拜堂<sup>①</sup>，让他们在那儿滔滔不绝地发言、争论、动议和反动议，到底是为了什么？一个国家大多数人的状况，就是这个国家的状况。你会说这在任何时代都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可现在，这个真理却迫切需要得到人们的认同，并采取相应的行动。要是闲着没事，就读读议会议事录<sup>②</sup>或各种晨报吧。无非就是要求讨论并投票，妥善解决那个古老的重大问题——让某甲或某乙来执政，以及随之而来的大把问题：加拿大问题、爱尔兰问题、西印度问题和女王寝宫问题，渔猎法和高利贷限制法，非洲黑人、亚洲苦力、

---

① 英国议会下院的议事厅。

② 指英国印刷商卢克·汉萨德与其子在1774年至1889年编纂的英国议会议事录。

史密斯菲尔德<sup>①</sup>的牛和双轮轻便马车。各种问题和话题铺天盖地，唯独缺少这个最最重要的问题！议员大人们当然应该讨论英国状况问题，尤其是激进派议员。他们可是人民之友，人民费心劳神地选举他们，就是让他们去代言并阐述人民那无声却深切的需求！在远远观望议会的人看来，他们似乎并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选他们进议会，不就是为英国利益说话的吗？这难道不是他们份内的工作、使命和当官的目的吗？英国的一切重大利益，只要不能自言，就应该由他们来代言。他们就是要替不能说话的劳苦大众说话，否则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

唉，远远观望议会的人还是不懂议会的实质啊！他不知道，本应为民做主的议会已经是自顾不暇；他不知道，议会只会例行公事，因循旧路，可那车辙都深得磨到车轴了，唯有靠拔山举鼎的力气、洞隐烛微的目光和英勇无畏的气概，才能把那议会或车辆给抬出来；他不知道，议会（不管是改革了还是没改革）中到底还有没有一个拔新领导、头脑清晰、心胸宽广、坚韧勇猛的人；他不知道，议会总体上也和我们很多人一样，在陈规旧习磨出的车辙里吃力地挪动，发现车辙已经太深了，都磨到车轴了，每前进一步，都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哪还有力气管别的事情？要弄清楚议会在这件事上早该怎么做，将会怎么做，能不能做，该做到什么程度，又该负什么责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们暂不深究。但它现在的所作所为，人们都看在眼里。到目前为止，在这个关乎全民族的问题上，“国家的集体智慧”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

① 伦敦最主要的肉类市场所在地。

但也不能把这个问题交给“国家的集体愚昧”啊！在这件事情上，必须扫除议会内外的一切愚昧无知、玩忽懈怠和痴心妄想，拿出真正的洞见。真正的洞见所带来的好处，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有了真正的洞见，上层社会就能切实理解下层民众的真正意义所在，就能清楚地把握令这些灵魂备受煎熬的想法。这些不会说话的灵魂已经出离愤怒，就像饱受痛苦折磨的生灵，挣扎，咆哮，却说不出来！他们混沌的心中确有想法，而且是正当的想法，因为他们的心也是上苍赐给的。上苍自然知道他们的想法，可我们不知道。要是我们也能知道就好了！知道了，也就等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老话说得好，一切冲突都源自误解；消除了误解，也就没有了冲突。没有人打心底里想要不正义，通常只是在争取某种模糊的、扭曲了的权利。虽然天生的愚昧和私心奇怪地模糊并夸大了这种权利的模样，而对抗的怒火又让这种模样模糊了十倍，最终变得面目全非，可它仍旧是一种权利。如果一个人肯承认他的奋斗目标是正当的，不符合公正原则和理性法则，他自然会承认这种目标是不对的，是毫无希望的，也就不会再为之奋斗了。而且，除了权利，如果对抗的双方能够准确地认识到彼此的实力，也会有一方选择偃旗息鼓，向对方以及不可抗拒的力量屈服，对抗也就结束了。今天去非洲探险的人，不会再像希罗多德那时那样，带上抵御南风的装备。在这方面，一次探险就够了。西蒙风<sup>①</sup>仍不时向南吹去，还和以前一样讨厌，一样猛烈，但一次探险也就够了。我们不都得向死神屈服吗？人一出生，就被判了最严酷的刑罚——死刑，可我们忍了，当那个时刻到来的

---

① 非洲、阿拉伯半岛等沙漠地带的干热风。

时候，我们都能平静地面对。确凿无疑的权利和确凿无疑的实力，两者弄清楚一样，也就没有了对抗。所有的对抗，都不过是为了弄清两者或两者之一而做的混乱的试验。

在当今时代，英国的工人阶级有着满腔的不满。他们的权利有哪些，实力又怎样？他们才是能够解开谜团的人，能够消灭社会瘟疫的人，能够完完全全地给我们答案的人！我们可以预言，令欧洲社会上层与下层势同水火的斗争（英国尤其严重且突出），也会和其他所有斗争一样，通过弄清权利和实力来终结并调整自身。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在此期间，先要解答这些问题：工人阶级为什么不满？他们家里的经济状况如何，心中的道德状况如何，在现实中是怎样的，在他们心目中又是怎样的？他们在抱怨什么？哪些是他们应该抱怨的，哪些是他们不应抱怨的？这些都是可以把握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任何人只要稍加关注，都能看出些门道。我们现在也公布了一些调研和思考，但肯做这种调研和思考的人还是太少。那些调研其实没有多少实质内容，但那些思考却酝酿已久，正迫不及待地要求发声。我们对这件事情的普遍认识，如果能够说出来，必将得到众多率诚之士的首肯。对此，我们还是抱有希望的。

（责任编辑：傅燕晖）